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美)詹姆逊
(Jameson, F.)著;王逢振,陈永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

(知识分子图书馆)

书名原文: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ISBN 7-5004-2556-2

I. 政… II. ①詹… ②王… ③陈…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IV. I109.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232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75 插页:4

字数:246 千字 印数:1—6000 册

定价:17.00 元

目 录

政治无意识和文化阐释(前言).....	(1)
前言.....	(3)
一、论阐释: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	(8)
二、魔幻叙述:关于文类批评的辩证运用	(90)
三、现实主义和欲望:巴尔扎克和主体问题	(137)
四、发自内心的愤懑:乔治·吉辛“实验小说” 中的文类断裂和意识形态素.....	(171)
五、传奇与物化:约瑟夫·康拉德小说中的 情节建构和意识形态的封闭.....	(192)
六、结论: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辩证法	(268)

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命形式。

——维特根斯坦

由于由整个概念系统所表达的世界是社会向其自身再现的世界，因此，只有社会才能提供这样一个世界必须得以再现的一般化了的观念……由于宇宙只有在它被思考的时候才存在，又由于它只能被社会本身加以整体地思考，所以，它置身于社会内部，成为社会内在生命的组成因素，因而可以把社会看作是那个种总类，超越那种总类便别无他物存在。这种整体的概念不过是社会的概念的抽象形式：那个整体包括一切事物，那个至高无上的等级统领所有其他等级。

——杜克海姆

前 言

永远历史化！这句口号——一句绝对的口号，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一切辩证思想的“超历史”的必要性——也将毫不奇怪地成为《政治无意识》的真谛。但是，正如传统的辩证法所教导我们的，历史化操作可以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运行，而最终只能殊途同归：即客体的路线和主体的路线，事物本身的历史根源和我们试图借以理解那些事物的概念和范畴的更加难以捉摸的历史性。于是，在文化领域，这也是本书所论的核心领域，我们面对着在两种事物间做出选择，一方面是对某一特定文化文本的“客观”结构的本质的研究（其形式和内容的历史性，其各种语言可能性出现的历史时刻，及其美学的特定环境功能），另一方面是与此相当不同的、反而会突出我们借以阅读和接受所论文本的阐释范畴或符码的东西。无论好坏，本书所选的是第二条路线：因而，《政治无意识》论述阐释行为的能动力，假定我们从未真正直面一个充满其作为物自体之鲜活性的文本，以此作为本书谋篇布局之所在。然而，文本总是作为已经读过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通过前此阐释积淀下来的不同层次或者——如果是崭新的文本的话——通过由继承的阐释传统积淀下来的阅读习惯和范畴来理解它们。因此，这个先决条件要求使用一种方法（我曾在别处称之为“元评论”[meta-commentary]），根据这种方法，我们的研究客体与其说是文本本身，毋宁说是阐释，我们就是试图借助这些阐释来面对和利用文本的。这里，阐释被解作本质的寓言行为，包括根

据某一特殊的阐释主符码重写特定文本。对后者的辨识将导致对这种符码或当今美国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现行的“方法”或方式的评价。这些方法与辩证的或总体化的、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理想的理解相并置，将用来说明其他阐释符码的结构局限性，尤其要表明他们建构研究客体和“遏制策略”的“局部”办法，并借此投射出它们的阅读似乎全面自足的幻觉。

因此，元评论的回顾性幻觉有利于我们依靠其他阐释方法——伦理的，精神分析的，神话批评的，符号学的，结构的，和神学的——衡量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行为的成果和力度，它必须在今天“多元主义”的知识市场上与之竞争。本书将根据语义的丰富性论证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的优越性。今天，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这些其他方法的替代来加以辩护，那样会得意洋洋地把那些方法送进历史的垃圾箱；这些方法的权威性产生于它们忠实的与一种破碎社会生活的这种或那种局部法则的和谐、与一种复杂而迅速蔓延的文化上层建筑的这个或那个亚系统的和谐。实际上，从一种比较可靠的辩证传统的精神出发，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被视为那条“不可逾越的地平线”，它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相容的批评操作，在它自身内部为它们规定了部分令人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既消解它们同时又保存它们。

然而，由于这种回顾性组织结构独特焦点，也许值得告诫读者《政治无意识》不是什么。首先，读者不应指望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初露锋芒的政治文化的探讨性描述，雷蒙德·威廉斯曾正确地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最迫切的任务。当然，当代马克思主义何以对这种挑战反应迟缓，有许多充分而客观的历史原因：日丹诺夫严格控制艺术的可悲历史为其一，对现代主义以及对形式和语言“革新”的迷恋为其二，此外还有整个新的政治和经济“世界体系”的来临，对此，老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已经难善其用。本书的临时性结论将阐明，在孕育那些位于我们自己世界疆域之外的新形式的集体思想和集体文化的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阐释必将面临一些挑战。读者将在那里看到一个空着的位子，它是为某一尚未实现的、集体的、解中心的、超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类的未来文化生产而保留的。

因此，即使本书不能提出一种政治的或革命的美学，它同样也不想再次提出传统的哲学美学问题：即艺术的本质和功能，诗歌语言和审美体验的特性，美的理论等等。然而，这些问题的缺场也许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含蓄的评论；我试图保持一种本质上是历史主义的视角，根据这种视角，我们对过去的阅读主要取决于我们对目前的经验，尤其取决于有时所称的消费者社会的结构特征（或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或消费者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的“非积累”阶段），即古伊·德波尔德所说的形象或景象社会。关键在于，在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里，老式哲学美学的那些问题本身就需要从根本上历史化，而且可以预见，它们将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

虽然文学史在书中各处都有暗示，但还是不应该把《政治无意识》看作今天已面临危机的这种话语形式或文类的范式。传统文学史是再现性叙事的子集，是一种与其在小说史里主要范例同样令人怀疑的叙事的“现实主义”。本书涉及文类批评的第二章将提出关于这种文学史叙事的状况和可能性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我把这种文学—历史叙事称作“历时建构”；继后对巴尔扎克、吉辛和康拉德的解读描述了一种历时框架——资产阶级主体在新兴资本主义中的建构及其在我们自己时代的精神分裂式的解体——但在这里却从未充分奏效。关于今天的文学史我们可以说，它的任务与阿尔都塞为一般的历史编撰规定的任务是一致的：不是详尽阐述其假定客体的某一实现了的活生生的假象，而是“生产”后者的“概念”。这的确是最伟大的现代或现代化的文学史——例如埃里希·奥厄巴赫的《模仿》——力图在其批评实践中——即使不是在理论中——所力图做到的。

那么，本书是否至少可能被看作一种新的批评方法的纲要或

描述呢？事实上，把本书的许多发现重铸为一种方法手册的形式，这在我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这样的手册将把意识形态分析作为它的目标，而且我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分析仍然是适于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批评“方法”的名称。鉴于上述理由，本书就不是那种手册，就必然以更激烈的论战精神清算其他敌对的“方法”。然而，不应该认为《政治无意识》的回顾性框架难以避免的黑格尔格调意味着这种论战式介入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最优先的考虑。相反，后者也必须成为阿尔都塞所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实践，即“理论内部的阶级斗争”。

然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读者来说，他们很可能会闻到本书弥漫的火药味，因此我将加上本应是不必要的东西，强调我从叙事分析的伟大先驱者们的借鉴。我在书中与他们进行的理论对话不应仅仅被看作对“虚假意识”的另一种否定批判（尽管它也确实是那种批判，实际上我还要在结论中清楚地阐明如何把这种批判姿态正确地用作非神秘化和意识形态的揭示问题）。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在叙事分析的领域，任何研究都难以忽视诺思罗普·弗莱的奠基贡献，A. J. 格雷马斯对整个形式主义和符号学传统的整理，特定基督教阐释学的遗产，以及更重要的弗洛伊德对梦的逻辑的不可或缺的探讨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故事叙事和野性的思维的逻辑探讨，当然还有现代时期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乔治·卢卡契在这个领域里瑕不掩瑜的巨大成就。本书从特定的批评和阐释角度对这些各相迥异、参差不齐的著作提出质疑和评价，即围绕渗透一切的叙事过程，重新建构意识形态的、无意识的和欲望的、再现的、历史的以及文化生产的诸多复杂问题的框架，（用哲学唯心主义的简略形式来说）我把这种叙事看作是人类精神的核心功能或实例(instance)。这一视角可以根据传统上辩证符码系统重构为对表现(Darstellung)的研究：在这个无法转译的名词中，现行的再现问题与截然不同的表现问题、或与语言和写作通过时间的基本叙事和修辞运动颇有成效地交叉

起来。

最后但却并非不重要，读者也许会惑然不解，一部表面上关注阐释行为的著作何以对阐释的合法性问题、对衡量某一特定阐释真伪的标准问题不予以充分注意。我恰好认为，通过简单地罗列不准确性或缺失，或列出未回答的问题的名单，任何阐释都不可能单凭它自己的条件而真的丧失能力。阐释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而是发生在荷马的战场上，那里无数阐释选择或公开或隐蔽地相互冲突。如果实证主义关于语言准确性的观点是惟一的选择的话，那么，我宁愿选择当下流行的对积极误读的张扬而不主张消极误读。如中国的一句老话所说，“操斧伐柯”（语出陆机《文赋》——译注）：在我们的语境中，只有另一种更加积极的阐释才能推翻和实际驳倒已经存在的一种阐释。

因此，我将乐于让本书的理论部分得到其阐释实践的判断和检验。但是，这种对立标志着当今所有文化研究的双重标准和形式困境，《政治无意识》也难以幸免：在模式和历史之间，在理论思索和文本分析之间，存在着一场争优的殊死战斗，前者试图把后者改造成许多纯粹的例子，引以证明其抽象的命题，而后者则继续冥顽不化地暗示说理论本身充其量是方法的框架，一俟进行严肃的批评实践便随时可以将其拆除。这两种倾向——理论和文学史——在西方学术思想中往往被看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值得在结论中提醒读者的是，还存在着超越这二者的第三种立场的存在。这第三种立场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它以辩证法的形式肯定理论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也承认历史本身的重要性。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于康涅狄格州吉灵沃斯

一、论阐释：文学是社会的 象征性行为

本书将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

这显然是比那种肯定为每一个人所接受的谦虚主张极端得多的一种观点，那种谦虚的主张认为，有些文本具有社会的和历史的、有时甚至是政治的共鸣。诚然，传统文学史从来不止探讨这样一些主题，如但丁作品中佛罗伦萨的政治背景，或弥尔顿与分裂教会派的关系，或乔伊斯作品中爱尔兰的历史暗喻。然而，我要论证的是，这样的信息——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再包含在思想史的唯一主义观念之中——并不产生如是阐释，而充其量是这种阐释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今天，这种与文化过去的尚古关系具有一种最终不再令人满意的辩证对应物；我指的是大量当代理论依据自己的美学、尤其是依据现代主义的（或更准确地说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来重写选自过去的文本的倾向。我在别处曾表明^①这种“文本的意识形态”如何建构一个稻草人或无足轻重的术语——被冠以“读者

^① 见《文本的意识形态》，载《杂俎》，第31—32期（1975年秋/1976年冬），204—246页。

的”或“现实主义的”或“指涉的”文本等不同名目——与之相对的那种重要术语——“作者的”或现代主义的或“开放的”文本，写作或文本的生产力——得以限定，并因此而被看作是一次决定性的突破。但是，克罗齐的伟大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不意味着一切历史都是我们的当代史；而当你的认识突破开始根据你当下的兴趣在时间上置换自身的时候，问题便出现了，于是，当你力主把福楼拜作品中的“文本的”或现代的东西全部挖掘出来时，巴尔扎克便会成为蒙昧的再现性的代表，而当你决定像罗兰·巴尔特写作《S/Z》那样把巴尔扎克重写为菲利普·索勒斯，重写成纯粹的文本和写作时，他又变成别的什么了。

在尚古精神与现代化的“相关性”或描述之间，这种不可接受的选择或意识形态的双重束缚表明，历史主义久已为之困扰的那些两难问题——尤其是某一遥远的甚至远古时代的文化丰碑要求在一个文化上完全不同的现在立足的问题^①——并不仅仅因为我们对其不予理睬而消失。我们即将进行的分析的前提是，只有一种真正的历史哲学才能尊重过去的社会和文化特性和根本差异，同时又揭示出它的论争和热情，它的形式、结构、经验和斗争，都与今天的社会和文化休戚相关。

但是，真正的历史哲学从来就不多见，而在当今世界的消费资本主义和跨国体系中适当的和可用的历史哲学又所剩无几。在以下的章节中，我们将有足够的机会强调基督教历史主义对方法的关注，以及西方传统中第一个伟大阐释系统的神学根源，并能进而认识到，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413—426)中达到巅峰的基督教历史哲学已不再对我们具有约束力。至于英雄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它的两个主要变体——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意识

^① 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于文学和文化批评的适应性问题；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反思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倾向的更清楚的陈述，见我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载《新文学史》，第11期（1979年秋），41—73页。

形态斗争中产生的进步幻想，以及体现中欧和东欧各民族截然不同的历史性、一般与赫尔德的名字密切相关的有机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当然都没有绝迹，但至少是由于它们分别在实证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幌子下称王称霸而败坏了名声。

我在此提出的观点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在哲学上符合逻辑的、在意识形态上令人信服的解决上述历史主义困境的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充分说明文化过去的本质神秘性，就如同吸血的提瑞希阿斯，这种文化的过去暂时恢复了生命和温暖，再一次被允许讲话，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传达那早已为人忘记的信息。只有当人类的冒险成为集体行为的时候，这种神秘性才能再次展现出来；只有这样——不是通过尚古的嗜好或现代主义者的描写——我们才能瞥见要求我们亟待解决的那些久已作古的问题，如原始部落季节交替的经济，关于三位一体的本质的激烈争论，城邦（polis）或宇宙帝国的众多冲突的模式；抑或在时间上离我们更近一些的，如 19 世纪民族国家枯燥乏味的议会和新闻论战。这些问题若要对它们恢复它们的原始迫切性，只能在一部伟大的集体故事的统一体内加以重述；不管它们采取怎样的掩盖和象征形式，只能认为它们共有一个单一的基本主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就是从必然王国争取自由王国的集体斗争^①；而且只能把它

①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有必需的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纽约，1977年）第三卷，820页；中译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1073—1074页。

们理解成一个单一庞大而未完成的情节中的关键插曲：“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①正是在查找那种未受干扰的叙事的踪迹的过程中，在把这个基本历史的被压抑和被淹没的现实重现于文本表面的过程中，一种政治无意识的学说才找到了它的功能和必然性。

从这个视角出发，社会和政治的文化文本与非社会和非政治的文化文本之间那种实用的运作区分变得比错误还要糟糕：即是说，它已成为当代生活的物化和私有化的症状和强化。这样一种区分重新证实了在公有和私有之间、社会和心理之间、政治和诗歌之间、历史或社会和“个人”之间那种结构的、经验的和概念的鸿沟，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倾向性的社会生活法则，它严重地伤害了我们作为单个主体的生存，麻痹了我们关于时间和变化的思考，正如它使我们完全脱离了我们的言语本身一样。假定在万能的历史和无法缓解的社会影响的保护下，一个自由王国已经存在——不管它是文本词语的微观经验的自由王国还是形形色色私人宗教的极乐和激情——那么，这种想法只能加强必然性对所有这些盲目地带的控制，而单个主体却在这些盲目地带里寻找避难所，追求纯粹个人的、绝对心理的救赎。从这些束缚中惟一有效的解脱开始于这样的认识，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

肯定政治无意识就是主张我们从事的这样一种最终的分析，并探索为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的文化制品祛伪的众多途径。它提

^①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纽约，1971年，81页。中译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250—251页。

出与上面已经罗列的那些阐释相抗衡的一种阐释；但是，如我们将看到的，它并不拒斥那些阐释的发现，而是论证它在哲学和方法论上对那些比较专门的阐释符码的终极优越性，这些符码的见地在策略上既受到其环境根源的限制，同时又受到它们理解和建构研究客体的狭隘的或局部方法的限制。

然而，把本书中包含的理解和分析说成是许多阐释，把它们作为一种新阐释学建构中的许多展品而呈现出来，已是在宣布一整套论战计划，它必然要与不同程度地敌视这些口号的一种批评和理论氛围相一致^①。比如，越来越清楚的是，阐释或解释活动已经成为法国当代后结构主义的基本论战目标之一，它以尼采的权威为强大后盾，旨在把这些阐释活动与历史主义相认同，尤其是与辩证法及其对缺场和否定的维护，对总体化思想的必然性和优越性的肯定。我赞成这种认同，赞成对理想的解释或阐释行为的意识形态的相近性和隐含意义的这种描述。但我认为这种批判是被错置了。

诚然，近来对阐释发起的最富戏剧性的攻势之一就是吉尔斯·德鲁兹和菲力克斯·伽塔里的《反俄狄浦斯》，恰如其分地把弗洛伊德的阐释而非马克思的阐释作为它的攻击目标；它认为弗洛伊德阐释的特点是把具体日常生活经验的整个丰富而随意的多种现实归纳和重写成被控制的、在策略上事先限制的家庭叙事——不管它是神话、希腊悲剧、“家族传奇”、甚或是拉康式的

^① 见米歇尔·福柯，“本原的退却和回归”，《词与物》第九章，第六节，纽约，1973年，328—335页，和他的《知识考古学》，尤其是引言和论“思想的历史”的章节，纽约，1972年；雅克·德里达，“过分：方法的问题”，《文字学》，巴尔的摩，1976年，157—164页，和他的“附加的书”，《播撒》，巴黎，1972年，9—67页；让·鲍德里亚，“走向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论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巴黎，1972年，和他的《生产之镜》，圣路易，1975年；吉尔斯·德鲁兹和菲力克斯·伽塔里，《反俄狄浦斯》，纽约，1977年，25—28页，109—113页，305—308页；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力必多经济学》，巴黎，1974年，尤其是“被称作马克思的愿望”，117—188页；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路易·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伦敦，1970年，尤其是“马克思的巨大的理论革命”，182—193页。

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构。因此，它所责斥的是一个寓言阐释系统，其中，一条叙事线索的证据由于根据另一叙事范式的重写而丧失殆尽，而这另一个叙事范式则被当作前者的主符码或元叙事（Ur-narrative），被认为是第一个叙事的最终隐蔽的或无意识的意义。勿庸讳言，《反俄狄浦斯》论证的有力之处与本书的精神相吻合，因为该书的两位作者所关心的是，重新证实日常生活的政治内容和个人幻想—经验的独特性，要求这种独特性从那种归纳回归给纯粹的主体，回到心理投射的地位，而这更典型地体现了当今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生活，而非仍然政治化的法国。我举此例的目的就是要指出，拒斥旧的阐释系统——弗洛伊德的重写被过于匆忙地纳入一般的阐释学，在《反俄狄浦斯》中与一整套阅读文本的新方法的投射是同时进行的：

无意识不提出任何意义的问题，而只关注应用的问题。欲望所提出的问题不是“那是什么意思？”而是“它如何运作？”……[无意识]不表现什么，而只生产。它不意味什么，而只发生作用。欲望以“那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的全部瓦解开始。除非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首先废除意义，否则没有人能够提出语言的问题；而只有当一部作品被看作是一台机器，产生某些效果，经得起应用的检验时，才能发现语言的最伟大的力量。马尔柯姆·罗利这样评说他的作品：你想让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只要它能转动——“相信我，如我发现的那样，它也转动”——一台机器。但是条件是，意义只能是应用而非其他，并要制定这样一条坚定的原则，即只有我们能随便制定决定合法使用的内在标准，以对立于是把应用与假设的意义关联起来并重新确立一种超验性的非法使用^①。

① 德鲁兹/伽塔里，《反俄狄浦斯》，109页。

然而，从当下的观点看，对文本进行内在分析、拆解或消解文本的组成部分、描述文本的功能和功能障碍，这个理想不等于整个废除一切阐释活动，而是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更充分的、内在的或反超验的阐释模式，这将是下文所要提出的任务^①。

I

然而，这股尼采式反阐释潮流在当代某种马克思主义中并非没有等同物：建构一种正统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事业必然会面对有影响的、人们称作结构主义或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出的对传统阐释模式的激烈反对^②。阿尔都塞本人关于这个主题的看法在他关于因果律（或“功效性”）的三种历史形式的理论中有所论述，这一文献对于当代理论如此重要，值得在此长篇引述：

马克思通过根本改造政治经济学而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可归结为如下问题：用什么概念才能思考刚好被认为是由某一特定区域的结构决定那个区域的现象的新型决定论？……换言之，怎样才能定义结构因果律的概念？……

我们可以非常简略地说，古典哲学……有两个而且只有

^① 换言之，从目前的角度看，德鲁兹和伽塔里提出的反阐释方法（他们称之为分裂式分析（schizo-analysis））也可同样被解作自成体系的新的阐释方法。令人惊奇的和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第12页注释中所罗列的大多数反阐释观点都感到有必要提出这种新的“方法”：其中有知识考古学，较新近的有“身体的政治技术”（福柯），“文字学”和解构（德里达），“象征性交换”（鲍德里亚），力必多经济学（利奥塔）和“符号分析”（朱利雅·克里斯蒂娃）。

^② 本节提出的问题对于任何关于阐释本质的严肃讨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技术上也是难以回避的，涉及远远超越文学批评范畴之外的术语和“问题框架”。它们必然会使一些读者感到这在哲学上是在陌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进行的学术练习，我们告诫这些读者应该马上越过本节而读关于文本的章节（第II节），那里，我们将讨论各种现在流行的文学批评流派。我们还应补充一句，在本节所论的属于我们的历史生成的层面上，所论及的“阿尔都塞式”作家并非都接受这番描述。

两个概念系统来思考功效性。源于笛卡尔哲学的机械论系统，把因果律归纳为**转变的**和分析式的功效性，不能用来思考一个整体对其各个组成因素的功效性，除非以超常的曲解为代价（如在笛卡尔的“心理学”和生物学中的曲解）。但是，第二个系统是可利用的，恰恰是为了处理整体对其各个因素的功效性而设计的：即莱布尼茨的**表现**概念。这是支配黑格尔全部思想的模式。但在理论上假定所论的整个问题都可归结为一个内在本质，对于这个本质，整体的各个组成因素只不过是表现的现象形式，在整体的每一点上呈现的本质的内在原则，这样，在每一时刻都可能写出直接充足的等式：某某因素（黑格尔哲学中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文学的、宗教的因素，等等）=整体的内在本质。这就是可能使人思考整体对其每一组成因素的功效性的模式，但是，如果这个范畴——内在本质/外部现象——随时随地都可应用于在所论的总体中出现的每一现象的话，那么，它就假定整体具有一种特定的本质，恰恰是“精神”整体的本质，其中，每个因素都作为“部分整体”而表达整个的整体。换言之，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确实有整体对其因素或组成部分发生功效的范畴，但其绝对的条件是，整体不是一个结构……

[功效性的第三个、即结构因果律的概念]可以完全归结于“表现”(Darstellung)这个概念，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关键的认识论概念，这个概念的目的恰恰是要表明结构在其效果中的**在场的**模式，因此也表明结构因果律本身。……结构并不是外在于经济现象来改变这些现象的面貌、形式和关系的本质，作为缺场的原因而作用于现象，之所以缺场是因为它在它们之外。原因在结构对其效果的“置换因果律”中的缺场仅就经济现象来说并不是结构外部的错误，相反，它恰恰是结构作为结构在其效果中的内部形式。这因此意味着这些效果不在结构之外，不是结构于中打下印迹的先存的客